

郎毅怀◎著



从国家主义到 民本主义

中国政治的体制与价值直观

国家以社会为本，社会以人民为本，
即民本主义之谓。千古是理，顺之者兴，逆之者衰。
中国政治体制只需要改革和朝前走，
而不需要折腾，更不需要开倒车。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从国家主义到 民本主义」

中国政治的体制与价值观

郎毅怀◎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国家主义到民本主义：中国政治的体制与价值观 / 郎毅怀著.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177-0143-9

I. ①从… II. ①郎… III. ①政治体制—研究—中国
IV. ①D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9925号

书 名：从国家主义到民本主义 / 中国政治的体制与价值观

著作责任者：郎毅怀

出版发行：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8层 100037)

标准书号：ISBN 978-7-5177-0143-9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960mm 1/16

印 张：18.25

字 数：305千字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联系电话：(010) 68990646 68990692

购书热线：(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http://zgfcbs.tmall.com>

网购电话：(010) 68990639 88333349

本社网址：<http://www.develpress.com.cn>

电子邮件：cheerfulreading@sina.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走出传统体制，终结历史循环

中国发展的列车在经过几千年缓慢行进甚至停滞、反复振荡之后，终于在20世纪末期进入高速行驶状态。就中国文明的文化基因而言，“高速”应当是一种正常的行进状态。这种状态，已被当代舆论誉为“世界奇迹”。

然而，中国发展的列车是否完全和真正摆脱了历史上曾经严重阻碍自己前进的束缚和羁绊？或者说，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我们在面对外在艰难险阻的同时，还有没有强大的内在束缚和羁绊？还有没有因为这些束缚和羁绊使发展缓慢甚至停顿下来的危险？

政治体制是其中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政治体制尚未完全走出传统甚至在一些不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向传统回归，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早慧的民族，也是一个特别勤劳、能干的民族。古代中国不仅有著名的“四大发明”，而且有领先于当时世界的化工技术、工艺设计技术、机械工程技术、金属冶炼技术和工程管理技术。存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司母戊大方鼎，作为诞生于遥远商代，也是全世界迄今所发现的体积最大的青铜器文物，可以向我们证明这一切。同时，中华民族还是一个乐于经商并善于经商的民族^①。

^① 吴晓波：《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至1869年》，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即乐于商道，并以“商”为国号。以后历代，都有商业繁荣的记录。汉代哲学家说当时从事工商业的人数10倍于农民，流通之盛，达到“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程度。到明清之际，“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屯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龚自珍）。在市场经济制度及运行和调控机制建设方面，中国先民亦领先于全球。生于公元前536年、卒于公元前448年的范蠡，在他主政的越国就开始以价格调控的方法促进粮食生产，并按照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来设计政策。他说：“夫粢，二十病农，九十病末。病末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史记·货殖列传》）意思是说，市场上的粮食价格如果每石下跌到只值20钱，就会伤害农民的利益和生产积极性，以至农田荒芜；如果每石上涨到90钱，就会伤害商人利益和积极性，粮食就难以顺畅流通，最后受损害的是农业和国家财政收入。所以，他主张把粮价控制在“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的区间内。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他说：“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这意思是说，只要搞清供求关系，就可以知道价格如何涨落和波动，并加以调控了。他的“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价格调控策略，就是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元代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宋代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批合股公司和第一代职业经理人，清初出现了粮食期货交易。这些都说明，鄙商并不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传统。

就是这样一个工商业文明成长领先于全球、经济总量曾经占全球1/3的早慧民族，却在近代成为“东亚病夫”，并沦落到被列强欺凌、宰割的悲惨境地。为何？国家主义政治体制束缚之故也！反复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导致一次次政变、暴动、革命，从而江山易主，改朝换代。但这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甚至以新的形式持续加剧。为何？国家主义政治体制依旧也！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改革开放才改变了国家对社会经济、政治的管理方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传统关系，传统政治体制受到颠覆，中国发展的列车才第一次真正进入良性运行状态，中国才第一次再现早慧民族的风采。

这样一个历时超千年的历史明确地告诉我们，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智慧的民族，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最需要的是开明的政治体制。只要政治体制开明，并充分地体现在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管理上，30年即可出现盛世，50年即可成为强大国度，80年即可成为全球领袖。显然，政治体制是我们民族盛衰的关键。从现代国际政治角度说，政治体制是国家软实力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综合国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抓住了政治体制问题，就把握了我们民族盛衰的钥匙。

我们现在正走在历经了“30年”并奔向“50年”的关键时刻，政治体制的进退决定着中国今后的走向与盛衰。

三

中国政治史有一条很鲜明的规律。面对经济凋敝、民穷国破的困局，王朝政权总是先实行开明政策，开放搞活，予民休养生息。一俟经济活跃，社会显露富象，原有的秩序和平衡被打破，就转而强化专制，实施严厉统治。从秦汉到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大抵都是在这种“放—收”交替、“乱—治”往复中度过的。这种无休无止、循环往复的轴心或动力源泉，就是国家主义的政治需要。没有“放”，君主专制的国家主义政治体系就会因为经济凋敝、民穷国破而垮台；没有“收”，日益强大的社会力量就会让既存的国家主义政治体制和政治秩序不能继续维持。所以，只要国家主义体制不去，中国社会就不能完全走出“收”与“放”和“乱”与“治”的反复性周期率，我们的发展就有盛衰逆转、回归起点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律简称为“反复率”。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这种可能性恰恰是一直存在的。

首先，从历史的视角看，我国政治体制虽经旧、新两次民主革命的冲击和3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仍未完全走出传统。在体制上沿袭了几千年的政治传统，是一种特别强大的利益力量和习惯力量。传统政治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当然也不愿意削弱和革除政治体制中的传统因素。一有机会，他们就会竭力加强政治体制上的传统因素。更重要的是，传统政治体制在几千年的时光中，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这种文化体现为人们的社会本能、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人们的心理习惯和行为习惯。从公元前七世纪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开始打造国家主义政治体制开始，十几个朝代，几百次政权易手，不但没能弱化国家主义政治体制，反而使之不断加强和完善。甚至到了民国及民国以后，还会发生袁世凯公然称帝、张勋嚣张复辟，出现蒋介石一人一党独裁体制。可见，国家主义政治体制如江河泻地，流远难收。新中国在政治体制上不接受这种强大传承是不可能的，改革中的政治体制要与国家主义传统迅速诀别也是做不到的。国家主义传统何其之重！在这种背景下再次重复“放—收”的历史循环，并非耸人听闻！现在的一些文学作品正在为传统政治体制歌功颂德，乃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其次，从现实视角来看，国家主义传统正在获得继续存在和强化的新“理

由”。我国经济的迅猛崛起，在国际社会获得高度赞誉，一些国际人士不仅赞扬崛起的中国经济，而且赞扬支持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中国体制”或“中国模式”。参加这种赞扬的，甚至包括了美国《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时代》这些西方重要媒体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美国未来学家、《大趋势》作者奈斯比特这些重量级名人。在外部的赞叹声中，我们第一次收获了巨大的民族自信和国家自信，同时也大量收获了“体制自信”，先前作为改革对象的体制又被一些人视为“国宝”欣赏和供奉起来。国内知识界涌动着重新评价改革开放前30年的思潮，认为那时的体制很好。有的人甚至认为皇权时代的体制也很有优越性。“体制自信”自信到这个程度，当属于自我麻醉和被外人“捧杀”了。既然过去的体制那么好，为什么中国经济早不崛起晚不崛起，却偏偏要在改革开放中崛起呢？显然，没有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中国经济崛起是绝无可能的。事实和道理虽然如此明了，“体制自信”还是让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严重地陷入体制自恋，因而在思想和文化上表现出向传统体制回归的倾向。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一次谈话中，也说到中国有一种“不愿意继续改革”的倾向。他对“改革”和“继续改革”的理解可能与我们不会完全一样。但他所说的“不愿意继续改革”的倾向应为客观、公允之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看到和感到，这种“不愿意继续改革”的倾向所导致的改革停滞甚至倒退，已经使体制上的国家主义时不时地有所加强，民众与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疏离感增加，各种社会矛盾也在继续积累，国家运行的政治基础变得相对脆弱。听任这种不愿意改革的倾向继续积累和膨胀，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历史的“反复率”，卓越的中国会重新变得平庸，“高水平停滞”将会再度上演。

因此，坚决地不走回头路，跳出中国政治史的反复率，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四

今天的我们从历史中走来，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从国家主义政治体制的历史中走来。不走回头路，就是不向国家主义政治体制和传统复归，就是把已经进行的改革继续下去。

那么，继续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执政为民。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提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要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障人民当家做主。这就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据此，我把这个方向和目标称作“民本主义”。

简单地说，国家以社会为本，社会以人民为本。民本主义政治体制是以社会为本、以人民为本的体制。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民本主义要把被国家主义的政治体制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过来，不断地从国家本位、官本位的体制传统中走出来，让人民真正和完全地成为社会的本体和国家的主人，使国家真正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人民。所以，从国家主义走向民本主义，说到底，是国家与社会、官与民相互关系的转换。民本主义不是民粹主义，更不是无政府主义。它并不排斥国家，只是要求国家转型，即由统治型国家转变为服务型国家，变国家统治社会为国家服务社会。或许那些很欣赏传统政治体制的学者可能认为民本主义政治体制会因为没有突出国家的强大作用而失去强大的动员力。但我要告诉朋友们，在民本主义政治体制中，国家仍然是一个基本要素。与传统政治体制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国家”已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专制力量，而是尊重和接受人民主体地位的服务力量。服务型国家与充满活力的社会相结合，将会造就更强大的动员力、更高的服务效率。

这里需要对国家概念作一点儿说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说，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并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强制力量”。这个论断既概括了国家从哪而来的问题，也深刻地指明了传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如果把传统国家与现代新型国家放在一起，作一个普遍性或一般性的概括，那么，国家就是政权体系或政权组织。这个“国家”就是政治学语意上的国家。这个国家概念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之“国”、“美国”之“国”即国别意义上的“国”，不是一个意思，或者说不是一个概念。后者作为国别意义上的概念，是社会与政权体系的组合体。“国”包含着社会与政权体系两个层面，并由国家即政权体系来代表。作为传统政治体制基本特征的“国家主义”概念中的“国家”，是政治学语意上的“国家”，指的是政权体系或政权组织。当我们使用“国家主义”并进行批评时，请读者千万不要将这里的“国家”理解为国别意义上的国家。同时，也要注意，“民本主义”概念中的“民”主要是人民，它不包括那些没有公民权的那部分国民。

五

坚持民本主义，并把民本主义贯彻和落实到改革的具体行动上，需要我们对政治体制的历史进行梳理和剖析。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知古方能通今。这是一项必要和必须做的理论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更清楚地理解国家主义政治体制与社会成长、发展的复杂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具体优势和弊端，才可能更清楚地了解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其民本主义指向，才能更明了地知道今天的政治体制应当改什么、怎么改。

中国政治体制的历史作为整个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辽远、壮阔、厚重而苍凉。它的产生和演变有着自己强大的内在逻辑性、合理性和尖锐的矛盾性。它是浩荡的文化长河，是风云诡谲、起伏跌宕的历史活剧。当我们面对它，并企图在文化上批判和超越它的时候，实实在在有一种沧海无涯、智穷难渡的无奈。但是既然研究和剖析传统政治体制的任务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只能知难而上、全力而为了。

在这里，能够支持我们真正有所作为的，绝不是所谓“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主流和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地为国家主义的传统政治体制的存续和强化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它不可能帮助我们政治上走出传统，而只能引导我们回归和延续传统政治体制。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在一次次政治动荡乃至革命中，我们一直不能真正从君主专制的国家主义政治体制中走出来，已经很雄辩地说明了儒家学说和整个传统文化的复旧功能。能够真正支持我们在研究和剖析传统政治体制问题上有所作为的，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发端的现代政治思想，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基础上诞生的新中国，亦未完全走出国家主义的传统政治体制。它甚至把国家主义政治体制发展到了极致，在政治体制上表现为全能化的国家主义。所以，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矛盾和阻力与历史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意识形态的阻力特别强大。当年，“主义论”可以随时把主张改革者和实际改革者打入“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行列。“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如同一把利剑悬在每个人的头上。但党和人民却成功地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其根本经验在于，经过两次民主革命的洗礼，特别是为“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学习和实践，人民权利至上的政治思想已经成为举国上下、体制内外都不得不接受、不能不接受的政治共识。于是，民众的贫困、国家的衰弱、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迫切需要，也就成了不可阻挠的

改革动力。政治家邓小平以自己卓越的政治智慧顺时应势，就如何评判改革开放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这“三个有利于”是判断具体改革举措可不可以做的标准，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邓小平标准”。第一条是人民幸福标准。一切有利于人民幸福、安康的制度安排和体制建构都是必须肯定的，一切不利于人民幸福安康的制度安排和体制建构都是必须否定的，不管这个体制冠以什么名义。第二条是发展标准。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制度安排和体制建构都是必须肯定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制度安排和体制建构都是必须否定的，不管这个体制冠以什么名义。第三条是综合国力标准。一切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的制度安排和体制建构都是必须肯定的，一切不利于提高综合国力的制度安排和体制建构都是必须否定的，不管这个体制贯以什么名义。这“三个有利于”（即“邓小平标准”）以摧枯拉朽的理论力量撕开了既存体制的防线，使改革如决堤之水，奔涌而出。

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在我们这样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崇尚人民主权的国度，“人民权利”特别是人民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政治改革的动力源泉，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合法性源泉。在历史地研究和剖析国家主义政治体制上有所作为，并对当今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所建议和启迪，必须也只能以人民权利至上（即民本主义）为出发点和思想利器。

六

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处在从国家主义走向民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当中。国内外各种力量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一进程发挥着或明或暗、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的影响。但民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改变和扭转的。正确把握这一趋势，并顺势而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合规律的，也才可能是有理有序有礼有节的健康过程。如果有意无意地企图重建国家主义秩序，到头来，不仅路走不通，而且会让我们的民族付出无法挽回的沉重代价。

以民本主义为指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扩大和保障人民权利，使人民更真实地成为国家权力和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这里既有外在的制约，也有内在的制约。外在的制约是国家主义体制或者说是这种体制的残余，以及由这种体制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内在的制约是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能力（包括收入水平）及其组织化程度。破解内外两方面的制约，破解内在制约是基础。这就需把政治体制改革同时作为一个发展过程。离开发展、停滞发展、放松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是不会有前途的。闭着眼睛高喊民权、民主的人，其实并不

真正懂得民权和民主。他们的高论对于实质性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无帮助。在当今世界，贫穷、落后国家政治生活的“高度开放”和“高度民主”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政治动荡和破坏，应该使我们明了这个道理。所以，激进主义的空谈和老调应当废止。一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和规划都必须把发展作为基础，并把发展问题纳入其中，使发展成为政治体制改革工程的基础性组成部分。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个被动、消极的过程。这是因为，发展本身是需要政治体制来保障的。发展的动力机制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巩固、修复和强化，发展的过程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规范、平衡和完善，发展的成果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公平、合理的分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发展，发展就会走偏方向，甚至停顿下来。所以，越是发展，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越强，政治体制改革就越是需要摆到日程上来，建立和形成主动改革的态势。目前，在一些地方，经济越是快速增长，社会问题就越多，老百姓的意见越大。这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我国的政治改革，特别是城市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严重滞后了。如果再不调整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和策略，切实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社会矛盾就会越积越大，总有一天要出大问题。

七

本书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强烈关切的支持下开始的。

目录

从国家主义到民本主义
中国政治的制度与价值观

第一章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 / 1

- 基本架构 / 4
- 运行特征 / 32
- 整体效能 / 62

第二章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风雨延续 / 93

- 环境变迁 / 95
- 痛苦挣扎 / 104
- 苦难歧途 / 121
- 徘徊依旧 / 128
- 山重水复 / 153
- 路在何方 / 177

第三章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历史扬弃 / 193

- 柳暗花明 / 195
- 前路尚远 / 206
- 近战攻坚 / 227

后 记 / 273

参考文献 / 275

第一章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

我国历史悠久，传统政治体制也有一个变化、发展乃至持续强化的过程。

但自西周末期“礼崩乐坏”，各诸侯国纷纷脱离周天子权威建立独立政权，分封制开始解体，这个体制大体保持了比较稳定的持续状态。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作为其发端，形成传统政治体制的雏形；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是其形成的重大标志，奠定了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退位是其颠覆性破坏的标志。我们所说的传统政治体制，就是指这种稳定态的政治体制，即从战国而始经秦、汉、唐、宋、元、明历代直至清朝末年实际实行的政治体制。

对于这个体制，近代以来，思想界和学术界已有否定派与维护派的分野。前者有蔡元培、吴稚晖、刘师复、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廖仲恺、马叙伦、张奚若等学界名宿，后者有辜鸿铭、康有为（后期）、梁启超（前期）、陈焕章、章士钊、钱穆等文化泰斗。与这些学者同时代的政治家们在执政前多为否定派，执政后多为实际维护派。从理论上说，把传统政治体制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研究、评价，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取舍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前一个问题是褒是贬，与在后一个问题上持什么态度，并无直接关系。但屁股决定脑袋，坐在什么位置就说哪个位置的话，就反映哪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和需求。历史上的学者和思想家、政治家们，无论是否定派，还是维护派，对传统政治体制的评价都与他们在当时政治变革浪潮中的政治倾向息息相关，或者说他们所表达的，都不过是他们自己的政治诉求。同时，他们的立论依据或价值标准不是西方的东西，便是传统的东西。用西方国家的政治理论框架来评判中国政治体制，结论当然是否定的；用传统

文化来证明传统体制，结论当然是肯定的。所以，他们的否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形而上学的否定；他们的肯定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形而上学的肯定。

因此，历史上，学者和政治家们对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评价虽有许多深刻和精辟之论，却很难说是客观、公允和科学理性的，因而难以作为我们立论的凭据。要客观、公允、理性、科学地评价中国传统政治体制，首先需要对它的基本架构、运行特征和功能进行历史性还原，让历史用事实本身给出结论。作为研究过程，这是整理、是归纳、是提炼，然后才是判断和评价。

基本架构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架构在三个基本层次上由三大要素构成：国家本位、中央集权、君主专制。

1.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以国家为本位，由国家统治社会，社会依附国家。这种政治体制，即谓国家本位体制，或称为国家主义

政治体制的首要问题和基本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或者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政治体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据文献记载，随着原始氏族社会组织的逐渐解体，聚居在黄河中下游的夏部族通过与周围其他部落的联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国家——夏。夏历时500年，至公元前17世纪，为商所取代。夏统治下的社会是一个完全的奴隶制社会。在这里，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尚不清晰。到商代，则有平民从没落贵族和奴隶中分化出来，并经过西周和东周战国时期，成为社会的主体即基本构成。在这大约10个世纪的时期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持续调整，社会有了自己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存在和生存权利，两者形成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在这一很长的历史过程中，三大因素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一是农业文明的影响。中国较早地进入农业文明。但长期停留于小农业经济时代。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年复一年地进行着简单的再生产，生产方式自给

自足并彼此雷同，生产者之间只有偶尔发生的协作，却没有社会化的生产和经济联系。在这里，只有邻里关系，彼此为左邻右舍，机制性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关系是不存在的。作为一种典型的同质型社会和松散型社会，它严重缺乏内在的经济联结力和凝聚力，用恩格斯的话说，这样的社会是“一袋马铃薯”。“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由于小农彼此之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不是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①这里引述的一大段话，是马克思说的。马克思的研究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在小农社会里，国家与社会必然是上与下、本与用、尊与卑的关系，即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国家以充当“代表”、提供“保护”、赐给“雨水”和“阳光”获得上、本、尊的地位，即小农和社会的拥戴；小农和社会则以卑、下、用的作用获得“雨水”和“阳光”。

与这种完全上下垂直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同，在君主时代的欧洲，国家与社会的实际关系主要表现为国王与商人阶级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近于平行的契约关系，是以利益的彼此交换为内容的“非正式联盟”。君主保护市民们不受战争和封建主任意征收苛捐杂税的侵害，保持和建立了一些比较完善的法庭以维护手工业者和整个手工业行业的权益。君主们还发放特许证给合股公司。如果必要的话，君主们还动用皇家海军作为商人们的后盾。与此相对应，商人和市民们则向君主提供财政支持作为报答。^②从这个对照和比较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明了历史发展的文明背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影响。把握农业文明这个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形成的基因和基础，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是宗法传统的影响。中国式国家建立和成型于宗法时代。宗法是中国古代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894页。

②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